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政策分析

——基于广深两地的实践与展望

■ 蒋雯静 陈建新 彭祥佑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发展大局中的重要战略部署，研究创新创业政策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策文件是政府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的指挥棒，通过对广州、深圳自2015~2019年共95份创新创业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广州是一核（科技创新）两翼（平台支持、人才支持）三均衡动力（技术平台、投资引导、财政扶持）类型，深圳是双核（企业创新、服务创新）双翼（科技支持、平台支持）三非均衡动力（服务平台、投资引导、财政扶持）类型。综合研究结果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功能定位，本文认为在“十四五”规划时期，大湾区各城市应继续做好科技驱动、企业引领工作，营造良好区域创新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价值链，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投资。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广州；深圳；政策文本

中图分类号：C913.2；D03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1）06-0100-11
DOI：10.13583/j.cnki.issn1004-3780.2021.06.010

一、引言

当前，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应对时代挑战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即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全国掀起创新创业浪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创新创业已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作者简介：蒋雯静，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共政策、社会保障、应急管理；陈建新，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养老保障、公共政策；彭祥佑，澳门理工大学应用科学高等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智慧治理、政策信息学。

展的新引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是对“一国两制”实践内涵的丰富，也是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有力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巨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2018）：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影响力指数排名第三，经济影响力位列四大湾区之首^[2]。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创业发展既可以为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城市群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也可以为今后提升城市群价值链和擘画区域错位发展蓝图奠定基础。

政策文件是政府进行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的指挥棒，它深刻反映了政府注意力的分配或者变化。鉴于粤港澳大湾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单独关税区”的特殊性与多元性，不同制度及语言环境下对同一概念的表述差异颇大，为保证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本文主要选取了广州和深圳这两个重要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据不完全统计，这两个城市自2015年到2019年共有95份创新创业相关政策文本。本文将通过共词分析和主题模型分析，试图发现地方政府创新创业政策的特点，尝试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创业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城市群的经济建设贡献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创新创业政策

关于创新创业（以下简称“双创”）政策，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进行较早，主要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视角独立或融合地展开对“双创”行为的理论研究及实证研究。Lois Stevenson和Anders Lundström认为创业政策主要包括激励（Motivation），机会（Opportunity）和技能（Skill）三个要素^[3]。Gnyawali和Fogel提出了创业环境的五维度框架，即政府的政策和程序、社会经济条件、创业和商业技能、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对企业的非金融支持^[4]。近年来，“双创”政策在国家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具体落实。地方政策是中央政策原则下的具体和丰富，反映了地方“双创”的政策特点与关注焦点、资源配置与精力投入。目前，对“双创”政策文本的分析，从研究手段来看，主要有质性分析和量化分析。单纯的质性分析易受主观因素影响，而定量分析在样本数较少的情况下有其局限性。相对而言，自动化文本分析能够全面地把握文本特征并掌握文本中各个维度彼此关联的情况^[5]，较能检视政策方向的交融演化。本文尝试通过比较广州、深圳两地的“双创”政策文本，以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创”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性建议。

（二）城市群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深化，参与国际竞争将不再是单个城市，而是整个城市群。城市群可以被看成是价值创造的主体，群内的单个城市是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节点^[6]。换句话说，单个城市是价值链上各个环节的具体区位，城市群就是基于价值链的空间布局的体系。在协同驱动整条价值

链的情况下,单个城市承担价值链上不同的分工环节,而该分工环节附加值的高低也决定了其在城市群中的地位高低及更替^[7]。

作为城市群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其规划历程最初可回溯至2015年。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写入国家文件;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为国家战略;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重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正式发布,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早在2011年,就有中国学者认为,广州、深圳等具有国际化都市特点的中国城市已经具备初步条件从传统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这是中国整体上介入全球城市价值链的重要战略措施^[8]。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布局为大湾区城市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32号)是“双创”政策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文件,该意见自2015年发布之后便掀起了全国创新创业热潮,相关政策呈现飞跃式增长。因此,本文将“双创”政策发布时间范围定于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的特殊性与多元性,为保证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本文主要选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两个主要内地城市——广州和深圳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地方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响应性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政策事项的重视,所以数据来源中除了两地市级、区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发布的政策文本外,也将地方政府转发上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纳入数据范围。政策文本只选择官方发布渠道,主要是广州、深圳两地政府官方网站及国家创新创业政策信息服务网。依据对现有“双创”政策文本的概览,本文选取“创新创业”“就业创新”“创新”“孵化”“众创空间”“创客空间”“创业投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小微企业”作为检索政策文本的关键词。

(二) 数据分析及结果解读

本文利用两种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文本分析方法——共词分析法(Co-word Analysis)和主题模型(Topic Modeling),并结合两种方法的优势对数据进行全面分析。基于共词分析的语义网络及主题分析结果,结合政策及公共管理理论对结果进行解读,得出两地政策的异同并进行分析讨论。在语义网络图中,词汇越处于中心的位置,则表示该词汇与其他词汇越有关联,越是一个常用的概念。除此之外,虽然语义网络图中较外围的词汇其中心性相对较低,但也属于高频词,并对其他重点词汇具有依赖性。在实际操作中,该类外围关键词较能反映政策中的具体措施和地方政府的区域性的施政方向,对本文的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性,同样值得关注。再者,本文计算关键词的特征

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特征向量中心度越高，说明该词在政策中越是核心及重要的概念，影响力越大。主题分析方面，由本领域专家检视并解释相关主题词的共同含义，并对每个主题做出概括性描述。在结果部分，本文还同时罗列每个城市中政策文本的主题、相关较高权重的词汇和人工概括性的主题描述，以供后续分析及引用。

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纳入到本文分析对象的“双创”政策文本共95份，其中广州57份，深圳38份。广州、深圳2015年至2019年的政策数量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从城市属性上来看，广州和深圳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副省级市，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后，广州和深圳都积极响应，大力推动地方“双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2018年，广州掀起了“双创”政策竞相出台的高潮，深圳则是在2019年大量地推出“双创”政策。由此可见，经过了一定程度上的政策摸索和城市定位，再加上中央顶层设计的指引，政策靶向更加明确，政策发布也就更加频繁，从2015年至2019年的五年时间里，广州、深圳两地的政策数量都呈总体增长的趋势。



图1 广州和深圳“双创”政策数量状况（2015~2019）

（一）广州、深圳“双创”政策关键词分析

1. 广州“双创”政策文本分析

从广州“双创”政策特征向量中心度来看，其主要在创新、产业、科技、技术、创业、平台、政策、人才、体系与人工智能等方面支持“双创”发展。高频关键词的前四位是创新、创业、科技和技术，占据向量中心度前四席的是创新、产业、科技、技术，说明科技创新是广州“双创”政策的核心。广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名列前茅且集聚效应明显，具有科技创新的智力资源。平台、政策、人才及人工智能等关键词词频及向量中心度也较高，说明广州在科技创新

2. 深圳“双创”政策文本分析

企业、创新、服务、创业、科技、发展、扶持、建设、平台和技术等是深圳市政府支持“双创”发展比较关注的方面。企业、创新、服务、创业占据了深圳“双创”政策文本关键词和特征向量中心度前四席，说明企业创新和服务创新是深圳“双创”政策的核心。深圳高新技术企业集中，追求企业与服务的创新也是情理之中。科技、发展、扶持、建设、平台和技术等关键词紧跟其后，说明深圳“双创”政策中企业创新和服务创新的着力点主要是科技支持和平台支持。众创空间、数据和制度等关键词现处于语义网络图的外围，代表了这些内容目前在“双创”政策中着墨较少但其影响不可忽视。深圳“双创”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图与前十位特征向量中心度如图3所示。

同样，通过查找包含该关键词的具体标志性政策，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每一组“双创”政策的具体涵义。作为创业载体，企业在深圳“双创”政策中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全方位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例如创业专项扶持资金和实体大厅、网上平台、移动应用、自助终端等一体化的公共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科技对企业、服务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科技评审制度对“双创”的支持，例如深圳为保障科技项目评审的科学合理和公正，规范了科技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科技项目评审管理办法、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等。平台对企业、服务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服务平台对“双创”的支持，例如建设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为小微企业提供有效服务支撑的场所。众创空间体现了深圳对“双创”孵化载体的重视。此外，在深圳“双创”政策文本中还体现了近年来深圳“数字政府”的改革部署，借助大数据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制度正如前文所述，一定程度上体现在科技评审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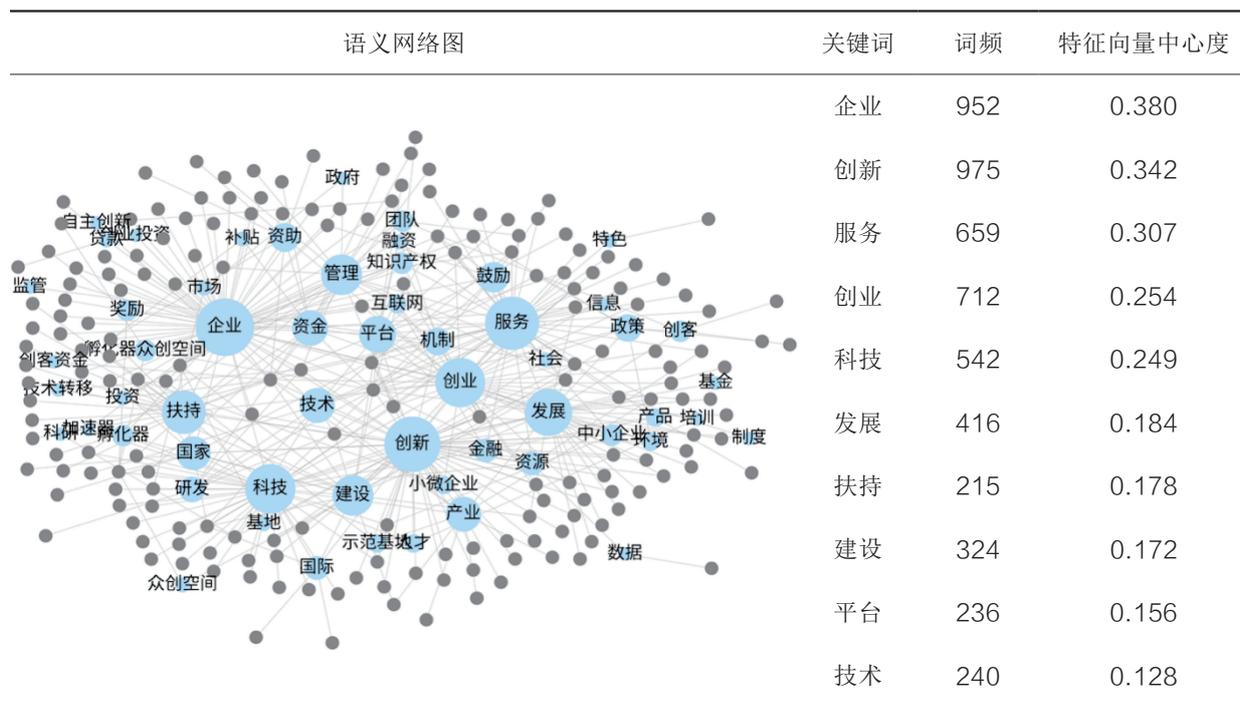


图3 深圳“双创”政策文本语义网络图与前十位特征向量中心度

结合以上的分析讨论,根据共词分析结果,广深两地的“双创”政策可以分别总结为“1+2+3”模式和“2+2+3”模式。广州“1+2+3”模式意指1个政策核心、2个着力点和3个潜在重点,其中科技创新是广州“双创”政策的核心,平台支持与人才支持是广州科技创新具体扶持举措上的2个着力点,青年、港澳、重点领域等是广州未来资源配置的3个重点方向。深圳“2+2+3”模式中,“2”“2”“3”依次代表2个政策核心——企业创新与服务创新、2个着力点——科技支持与平台支持和3个潜在重点——众创空间、数据和制度。

(二) 广州、深圳“双创”政策主题分析及讨论

主题分析的结果可以和基于质性研究的判断分析相互印证补充。如表1和表2所示,广州和深圳的“双创”政策文本主题可以分别提炼为五个维度。按数量多少排序,广州依次为技术平台开放、投资引导机制、财政优化扶持、新兴产业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深圳依次为财政优化扶持、公共平台搭建、投资引导机制、创新人才激励、企业人才激励。

表1 广州“双创”政策文本主题分析

政策文件主题	技术平台开放	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引导机制	新兴产业发展	财政优化扶持
政策文件 核心内容	汽车	资金	机制	人工智能	就业
	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	投资	知识产权	补贴
	国家	科技厅	创业投资	智能	基地
	产业	管理	金融	产品	政府
	中心		融资	产业	
	体系		管理	中心	
政策文本数量 (单位:份)	15	7	14	10	11

表2 深圳“双创”政策文本主题分析

政策文件主题	财政优化扶持	创新人才激励	企业人才激励	公共平台搭建	投资引导机制
政策文件 核心内容	扶持	自主创新	中小企业	平台	鼓励
	管理	贷款	人才	政策	创业投资
	资助	科研	奖励	创业	基金
	创业	技术		技术	国家
	国家	奖励		机制	机制
		人才			
政策文本数量 (单位:份)	17	4	2	11	4

平台建设与开放、投资引导机制、财政优化扶持是广州与深圳“双创”政策文本共同的主题，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别。

首先，广州对平台的重视程度略高于深圳。广州强调技术平台的开放，即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专利信息资源以及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向社会开放；深圳更侧重的是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具体表现在加强创新创业信息资源整合后建立创业政策集中发布平台，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

其次，投资引导机制方面，主要体现在加快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建立和完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从这一方面的政策文本数量来看，广州对此的重视程度要远大于深圳。

最后，财政优化扶持方面，即加大对“双创”的财政资金支持和统筹力度，从政策文本数量来看，深圳的重视程度高于广州。

综合分析，在广州、深圳“双创”政策文本共同关注的三个方面即平台、投资、财政，广州对平台、投资及财政的重视程度是相对均衡的，从政策文本数量来看，分别是15份、14份、11份，这可能与其作为省会城市需要协调布局的考虑有关。而深圳的关注重点十分清晰，平台、投资、财政的政策文本数量分别是11份、4份、17份，即对投资引导的关注显著低于平台建设和财政扶持。

新兴产业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是广州“双创”政策主题中不同于深圳的两个方面。新兴产业发展就是致力于发挥市场力量，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电子商务等有机结合，这可能是因为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和千年商都，发展历史悠久，为激活“老城市新活力”，更加重视区域内整条产业价值链的协同驱动，致力于拓展城市群内各城市的错位发展空间，避免产业同质化。科技成果转化体现在高度关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产学研用协同。而创新人才激励和企业人才激励是深圳“双创”政策独有的主题，体现在支持大学生、科研人员、境外人才来深创业，在绩效评价机制的基础上奖励人才。

结合上述的分析讨论，我们可以根据主题分析结果将广深两地的“双创”政策主题分别总结成“均衡-科技导向”型和“非均衡-人才导向”型。均衡与非均衡针对的是两地在共同关注的主题中——平台建设与开放、投资引导机制、财政优化扶持，政策注意力是否协调分配。导向针对的是两地在非共同关注的主题中——科技与人才，各自的政策注意力分配较多的方向。

五、结论与展望

综合而言，广州和深圳近年来对创新创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各有侧重，上文根据共词分析和主题分析结果将广州、深圳的“双创”政策类型分别概括为“1+2+3”模式、“均衡-科技导向”型政策和“2+2+3”模式、“非均衡-人才导向”型政策。具体展开来看，广州的“双创”政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平台支持、人才支持为两翼，以青年与港澳的交心交融、重

点领域的有效投资为操纵系统,技术平台、投资引导、财政扶持均衡地充当动力装置,新兴产业和科技成果转化辅助动力装置,各部分协同配合助力“双创”的发展与飞跃。深圳的“双创”政策以企业创新、服务创新为双核,以科技支持、平台支持为两翼,以众创空间、数据和制度为操纵系统,服务平台、投资引导、财政扶持非均衡地充当动力装置,创新人才、企业人才激励为辅助动力机制,各板块分工合作助推“双创”的成熟与落地。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与其他国际性湾区的不同之处是其多中心城市的湾区属性,大湾区内有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等四个中心城市,每个城市凭借不同的功能主体定位拉动其他七个城市的协同和错位发展,因此广州与深圳的“双创”政策有不同取向也是情理之中。澳门被广泛认同为成功落实“一国两制”的典范城市,长期具有博彩旅游业和自由港的优势,若能更完善地融入大湾区来提高产业链的水平,定能更有效地拉动大湾区西部的经济发展;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若能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融合,有助大湾区内城市的“双创”企业涉足国际市场。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相继发布,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发展,提高创新创业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契机。那么,粤港澳三地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实现金融、科技、产业和服务等向高质量高增值方向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值得探究的议题。为进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建设与发展,结合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展望:

首先,继续做好科技驱动、企业引领工作,营造服务优化、平台支持、财政扶持、投资引导、人才保障的区域创新环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湾区内各城市须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巩固深化大湾区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之间的联系,实现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尤其发挥城市内优质企业的引领作用。根据2021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显示,今年入榜的广东企业共有16家(深圳8家、广州5家、佛山2家和珠海1家),加上香港的9家,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5家企业入榜,今年新晋的企业分别来自广州和香港,广深与香港的差距正在缩小,广深“双城联动”效应明显^[9]。可以看出,大湾区企业实力不凡但仍有上升空间。另外,粤港澳大湾区的高等教育水平不容小觑,香港坐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三所研究型大学,长期占据世界大学排名较前位置,广州有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两所“双一流”大学,深圳有深圳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以及澳门的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等后起之秀。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结合企业与高校强化产学研互动的优良基础,势必为“双创”事业发展带来充足动力和光明前景。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提升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的关键,企业作为资金、技术、信息及人才等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整体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价值链,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创新能力是非均衡的。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2020)》,2015~2019年,珠江东岸发明专利总量排名第一,其次是珠江西岸,而港澳地区数量较少。其中,广州、深圳、佛山、珠海、惠州、香港六地发明专利施引比发明专利数的值高于0.5,是粤港澳大湾区发明专利质量较

优的创新城市。但值得注意的是,对比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专利施引数量方面较为落后,与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存在较大差距。另外,针对跨城市合作问题,广深、广佛、深莞、港深、澳珠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合作最为紧密的创新城市。其中,广深两地跨城市专利合作率达6.59%^[10],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城市协同创新上有了较大的提升,湾区城市融合发展态势形成,但与此同时,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央政府就提出要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11]。协同驱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价值链,离不开“9+2”大湾区城市群承担价值链上不同的分工,“双创”建设既要立足城市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协调资源生态格局与产业空间分布,又要遵循国家主体功能定位的指引,力求产业区域分工匹配城市功能,发展空间合理错位。例如科技创新方面,广州的教育科研与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深度合作;电子信息产业方面,深圳研发与东莞制造可以高度互补,香港的国际资源与深圳的科技产业互补,澳门的博彩旅游与珠海的现代制造互补。政府在“双创”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过去各城市都曾独立地向“双创”企业提供不同层次的扶助,不能否认的是,单独施策一定程度上非常容易背离精准扶助的顶层设计,故而粤港澳大湾区内应建立健全支持“双创”的协调机制,推动政策协同^[12-13],并透过智慧政务对“双创”企业进行更精准的识别、扶持和管理,善用大湾区多元产业结构,为“双创”企业寻找更合适其发展的土壤。分工环节附加值的高低决定了其在城市群中的地位高低及更替,大湾区内城市都应积极参与,在大湾区内打造完备高效的产业链。

最后,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投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仍未消退。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报告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加速推进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等措施可以在较大程度对冲疫情影响,“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大概率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14]。数字经济催生的各种新业态,例如5G建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工业互联网等成长潜力巨大,将切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根据《大数据蓝皮书: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No.4》显示,广东省的大数据发展现状和潜力在全国都居于领先水平^[15],这为广东省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提升大湾区总体实力提供了技术保障。未来在轨道交通、市政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粤港澳大湾区有效投资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例如横琴新口岸,粤澳新通道、莲塘/香园围口岸等相继建成,都是基础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的典范。新基建(5G网络和特高压建设等)将极大地推动“双创”企业的发展,若能统一大湾区内各城市新基建的标准,定会加速大湾区内的生产要素流动,从而让各城市优势互补,全方位多层次地把握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机会。

总而言之,粤港澳大湾区的“双创”发展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仍然任重道远,但倘若大湾区内各城市因地制宜、相互配合,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目标也依然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 [1] 金碚.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1): 5-18.
- [2] 刘彦平. 四大湾区影响力报告 (2018): 纽约·旧金山·东京·粤港澳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37-39, 191-195.
- [3] STEVENSON L & LUNDSTRÖM A. Patter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SM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Ten Economies [M]. Vällingby: Elanders Gotab, 2001: 21-23.
- [4] GNYAWALI D R & FOGEL D S.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Key Dimensions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 (4): 43-62.
- [5] 王扶东, 王苑潼. 基于 LDA 模型的国内“一带一路”文献主题研究 [J]. 情报探索, 2019 (11): 129-134.
- [6] 甄延临, 张杰军, 陈怀录. 基于价值链的我国沿海城市群城市地位演化研究——以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城市群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08 (8): 110-120.
- [7] 张少军, 刘志彪. 区域一体化是国内价值链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以长三角为例的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0 (11): 118-124.
- [8] 张鸿雁. 全球城市价值链理论建构与实践创新论——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市化理论重构战略 [J]. 社会科学, 2011 (10): 69-77.
- [9] 大湾区 25 家企业上榜世界 500 强 [EB/OL]. (2021-08-25) [2021-09-05]. https://www.ndrc.gov.cn/xwdt/ztl/ygadwqjs1/202108/t20210825_1294560_ext.html.
- [10]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发展报告 (2020) 正式发布 [EB/OL]. (2020-11-18) [2021-09-06]. <http://gd.people.com.cn/n2/2020/1118/c123932-34422283.html>.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ER/OL]. (2006-03-18) [2020-09-28].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6-03/18/content_5347869.htm.
- [12] 陈铀, 吴伟东. 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政策研究——基于广州、深圳、珠海的政策对比分析 [J]. 青年探索, 2021 (2): 89-101.
- [13] 方木欢. 粤港澳大湾区港澳青年创业的政策机制与优化路径 [J]. 青年探索, 2019 (5): 84-91.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 深化数字经济测算研究 [EB/OL]. (2020-09-11) [2020-10-06]. http://cass.csn.cn/keyandongtai/baokanchuban/202009/t20200911_5181565.shtml.
- [15] 连玉明, 张涛, 宋希贤. 大数据蓝皮书: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 No.4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70-77.

(责任编辑: 谢碧霞)